谁来背负书包

邬峭峰

电梯的两扇门开启，门外或有小孩站在当中，未等人出来就往里钻；家长在孩子的后面或侧面，默许。假如等候地铁，这样的家长中，多半会涌现一些向车内横冲的乘客。当他们下车获得同样阻挡时，会反感吗？估计以麻木为主。很难猜测，必要的利他提醒，在他们以往的日子里是否出现过。其实，只要有一点点角色置换的想象力，人们在公共空间的冲突，就会减少。在物质条件改善明显的今天，和睦的公序良俗，仍需以乐于给人方便的友善意识来维护。

十多年前，在某地一家咖啡馆的单人小洗手间门外，有四名华裔小学生在等候用厕。当我出现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叔叔，先来。”我浑身颤抖了一下，仿佛已经不适应这样的礼让。

我家附近有座贯通四方的天桥，一年四季，我在上面频繁见到一对对上年纪的老人，每人肩上都背着孩子的双肩书包，两个小学生模样的孩子轻松走在前面。那座天桥最初没有安装电梯，老人拾级而上时，会下意识地搓揉膝盖，而徒手的小学生，像是从未想过由老人肩负自己的书包是否合适。即便老人们心甘情愿替孙辈负重，但作为一种市井风气，在一片祥和中，还是让人看到些不美妙的内涵。

老人背着的书包做工精良，上面醒目写有某某小学校名，显示该校的总体规格似高级于普通学校。我很难产生敬意，该校上下对学生让老人背负书包木然，可见该校的精神规格很一般。该校的教育工作者或会觉得冤枉，理由是学校似乎抵御不了社会影响，也左右不了家长的选择。

当随处可见老人背负孩子的书包这类忽视孩子意志品质和良好价值观培育的现象时，在社会、家庭和学校这三者中，我首先想到学校。学校有工作管道，又能直接通过启发学生，来传播影响。教育工作者有义务告诉学子，一出校门，就让七八十岁的老人为自己背负书包，是一种羞耻。这也表明，学校缺失在孩子启蒙时代就应开始的关于担当的教育。请具有社会意识，请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工作者，去影响难以界定修养水准的老年家长；总比颠倒过来更合理，总比把责任全部推给家长、家庭和社会更合理。

某些乐于辛苦的老人会说，那只书包确实太沉重了。那就更不该让老人去承受，学生书包从功能到承载的重量，都并非为老人而设。如果偏重，也应由学校想办法去调整。眼下，把书包换成带滚轮的旅行箱，算是进步吗？会否有一天，给每位学生发一辆电动黄鱼车，以方便他们每天运送读书的辎重。

我不认为凡教育问题，都只让学校背锅。比如，学校越来越像一个习题及应试研究中心，人格和意志品质的培育功能严重丧失，这就不能单方面追究学校的责任。

教师的经历告诉我，家长在哪里不适当地多做了一块，将来孩子就会在哪里缺掉一块。缺掉的那块，很可能是某项重要的能力、魄力、智力或耐力。真正有智慧的家长，是极少惯孩子的。孩子的行为里，折射着成人的处世观。

大街上，老年人替学生背负书包已十分普遍，可以视作溺爱泛滥。孩子的确极为金贵，但越是珍惜孩子，就越是应该重视幼年教育。承担、分担，这些是孩子们从小就该培植的担当意识，很可能被家长的过度包办带偏，孩子们将来还会说“叔叔，先来”吗？恐怕到他们自己成为叔叔了，也未想到过人生还有这样温暖的语言。

书包沉重，由谁来背负书包的话题，同样沉重。假如，任由从小就缺乏担当、缺乏他人意识的学子，一批批从学校走向社会，历史将如何来描述21世纪中国的义务教育和家庭教育呢？

学校的墙上，醒目涂刷着“民族复兴、走向未来、国家栋梁、茁壮成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只书包，谁来背负？这个设问，和上述字眼一点关联都没有吗？我的眼前，强迫性地出现一幅漫画，某个学校的全体家长人人背负着孩子的双肩书包，在写有这样标语的墙前浩荡走过，孩子们徒手走在他们的前面。

这幅漫画的标题暂定为：让祖国的花朵，就这样开放吗？

渡江（皮纸、墨、矿物色） 何振江

冰心早期的小说散文

周丹枫

在我的书橱里，收藏着一本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冰心小说散文选集》，封面和封底因年久而破损，我小心翼翼地用透明粘胶薄膜把它补好；三百多页纸张都已黄而又脆，翻阅时必须加倍小心。我十分珍爱这本书。

冰心的短篇小说和散文温婉、纯真、细腻。

《斯人独憔悴》发表于1919年《晨报》，是冰心早期创作的重要短篇小说，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的重要作品。小说以青年学生反对日本侵占青岛的历史事件为背景，以颖铭、颖石兄弟和父亲化卿的思想冲突为切入点，揭露了封建官僚父亲剥夺儿子参加爱国运动和上学权利的专制手段。作品通过细节描写，如颖石“闷来便拿起笔乱写些白话文章，写完又不敢留着，便又自己撕了……”颖铭“每天临几张字帖，读几遍唐诗，自己在小院子里，浇水种竹……”颖贞“走到小院的门口，还听见颖铭低徊欲绝的吟道：‘……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深刻地展示了他们的精神困境，在残酷的现实压迫下的无力感。

边看边聊

《冬儿姑娘》创作于1933年11月。小说通过冬儿的故事，描写了一个女孩的成长历程，也揭露出当时对女性的压迫和不公。冬儿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姑娘，“她从八九岁就会卖鸡子，上清河贩鸡子去，来回十七八里地，挑着小挑子，跑的比大人还快。”她是一个性格倔强的女孩，她不信鬼神，听了那迷信骗人的话，“一声也没言语。谁知道她后脚就跟了香头去，把人家家里神仙牌位一顿都砸了……”冬儿就是一个在旧社会困境中苦苦挣扎而坚强不屈的女性。作品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关切和对旧社会的批判。

这本选集的其他几篇短篇小说，如《我们太太的客厅》，最早发表于天津《大公报》，后收入北新书局1935年出版的小说集《冬儿姑娘》中。这是冰心的重要作品，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也是至今仍备受关注的冰心短篇小说。《寂寞》《三年》等也各具特色，短小精悍，文字简洁，十分耐读。

本书所选的散文，其中《寄小读者》，篇幅最长，达一百页，由29则通讯组成，写作时间自1923年7月至1926年8月。贯穿全部“通讯”的是对大自然、母爱、童真的歌颂。它是影响了一两代少年儿童的名作，是当年孩子们宝贵的精神食粮。她在“通讯四”中写的江南景色：“有时远见大江，江帆点点，在晓日之下，清极秀极。我素喜北方风物，至此也不得不倾倒于江南之雅淡温柔。”使我这个一直生活在江南的小读者对这片土地和江河更热爱，更增添了对它的恋情。她对母爱的理解是那么的深刻；对母亲的爱是那么的深挚和纯真，使我们小读者如沐春风，深受教育。“通讯十二”有些话，我至今刻骨铭心：“真的，小朋友！别离之前，我不曾懂得母亲的爱动人至此，使人一心一念，神魂奔赴……我不须多说，小朋友知道的比我更彻底。我只愿这一心一念，永住永存，尽我在世的光阴，来讴歌颂扬这神圣无边的爱！”“小朋友！为着我，你们自此留心，只有母亲是真爱你的。她的劝诫，句句有天大的理由。花鸟虫鱼的爱是暂时的，母亲的爱是永远的！”冰心的字字句句都是她寸草心的袒露，都是对我们小读者进行爱的教育。我不禁联想起这本选集《南归——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中这一记叙：“我们再看不见母亲了，应该有些东西殉葬……我自己还放入头一次剃下来的胎发（是母亲珍重的用红线束起收存起来的）以及一把‘斐托斐’名誉学位的金钥匙。”这把女儿对母亲深厚的感情，真挚和朴素地表达出来了，读之令人动容。

我多么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抽出一点时间读读这些距今一个世纪左右的文学作品。我想前辈老作家留下的这些宝贵的文学遗产，一定也会给大家精神营养。

后弄堂

任炽越

距十六铺码头不远，在高低不平的鹅卵石铺成的高桥路上，有一条南北向的小弄堂。这就是我孩提时代，弄堂里大人小孩俗称的“后弄堂”。

后弄堂没有名称，是人民路68号到78号几十家住户的后门。夏天几个月，这个几百米长、四五米宽的后弄堂，就成了孩子的天堂。

后弄堂的弄口，是一个过街楼，上面是小东门街道房管所从石库门房子边上搭出来的会议室，两面有窗，前后通风。弄堂里的小孩子在后弄堂里玩得开心。有的用一块席子铺在地上，坐在上面玩“争上游”，有时还来些小刺激，输赢橄榄核或玻璃弹子。有一年夏天，流行下围棋，大明小明兄弟俩，在母亲鼓励下，自制了一副木质围棋，引起了弄堂里小伙伴们的兴趣。因人多，每个人都争着要先下，只好在剪刀石头布后，采取“打擂台”赛制，输了就换人。

每当夏日来临，我们总要去做三件事。一是泡冰水，二是买断棒冰，三是滚着铁圈在周边巡游。冰水泡来以后，大家迅速各回各家，分头准备泡冰水的材料，有绿豆汤、酸梅汤、桔子粉等，在夜里乘风凉时拿出来喝，各显神通。在高桥路右拐的人民路沪南电影院旁边，有一家食品店，每天下半天四点钟左右，会集中供应三分钱一根的断棒冰。后弄堂袋袋里有钞票的孩子，下半天三点半左右就主动在弄堂口等好了，等辰光差不多时，一群人就冒着烈日，在梧桐树荫的遮掩下，一路疾行而去。

断棒冰虽比普通4分钱一根的正品棒冰便宜了1分钱，但不足的是不能捏着棒头从容地吃，只能用棒冰纸裹着棒冰，匆忙地咬。有时候心急慌忙，咬得不巧，咬剩下的一块，啪地掉落在地上，3分钱只吃到小半根棒冰。

滚铁圈的日脚，一般在台风刚过后的第二天，太阳不猛，凉风习习，大家自然而然地在四五点钟滚着铁圈在弄堂口集中，不知谁一声叫唤，出发！十几只铁圈排列成一支铁圈队伍，一群赤着膊的“黑小子”，浩浩荡荡地从人民路出发，在新开河路转弯，向中山东二路小转，一路来到了大达马码头旁的江边。

此刻，太阳已经西下了。江尽头的天际下，一团团五彩的云团，在悄悄地聚拢，描绘着城市彩色的背景。暮色中，宁波轮船正在解缆起锚，大烟囱里吐着白色的烟雾，悠长的回声在空中回响。

我们十几个铁圈队员，一声不响地趴在江堤上，安静地看着轮船，慢慢消失在漫天霞光之中。到底还是要回家的，回到后弄堂里，计划下一次的“白相”。

给蔬菜找朋友

张秀英

进菜园，先看到的是一畦摇曳着的菜花，菜花旁边是一畦莴笋，莴笋尺把高了。看见莴笋，我脸上的笑意没了。莴笋的叶子黄了，有点蔫，蔫了的叶子耷拉在地上，手一碰，像是碰上了一摊水，叶子成了和稀泥。再看莴笋，莴笋拦腰黑了一片，伸手握，手还没用力，皮已脱离笋茎，也是烂糟糟的感觉。我明白：今年的莴笋，白种了。

前几天还碧绿生青的莴笋，即将好吃时却坏掉了。母亲皱眉问我：你是不是将青菜和莴笋种在一起了？我点头。莴笋最怕青菜花，你不知道它们是冤家？我一愣：蔬菜和蔬菜之间也有冤家？母亲告诉我，除了青菜和莴笋不能挨着种，有几种蔬菜也不能随便种在一起的，比如番茄和黄瓜、番茄和落苏，还有黄瓜和香瓜（南瓜），虽都是瓜，也不能挨着种。假如种一起，就和我的莴笋一样，白种，没得吃。

为什么呀？各自扎根在各自的土地里，只是靠得近些，有这么严重？母亲说这是她种了几十年蔬菜，碰到许多次的“白种”才知道的事实。她叫我相信她的经验，再三叮嘱我：种菜，先要给蔬菜找对朋友，找对了，省肥、省力气，有菜吃、饱肚皮。

之后，我按照母亲的教导，先规划好各种蔬菜的位置：青菜，种在菜园的最里边，然后依次是芹菜、菠菜、土豆、大蒜，再过来就是莴笋，莴笋的旁边是原本就种好的韭菜。母亲说，莴笋不像其它蔬菜那样皮实，对采光和通风要求很高，不可以种在高个子蔬菜的旁边。莴笋也不喜欢花，其它蔬菜的花瓣落它叶子上，叶子就会黄了蔫了，这是莴笋有种没有吃的主要原因。母亲说：还有一点，蔬菜的花瓣里，有破坏莴笋生长的东西，大蒜韭菜恰好没有花。是的，我相信母亲，这样的安排，莴笋和韭菜、莴笋和大蒜，互不干扰，各自长好。

又至春日，菜园里一派生机。最里边的青菜起蕻了开花了，黄绿相间，很让人亮眼。而隔了几畦种的莴笋，叶子绿油油的，只有一尺多高、胳膊般粗，笋茎笔挺、嫩相，精气神十足。我拔了两只莴笋，乐着去向母亲炫耀，母亲嫣然一笑，说我听进了劝告，给莴笋找对了朋友。

找对了朋友，蔬菜相扶相持，就能长成人们需要的样子；找错了朋友，蔬菜吃苦受罪，种菜的人也得不到收获。人与人之间，大抵也是这样的。

七夕会

张辽的逍遥津

俞果

近日，我来到合肥。合肥有个古逍遥津公园，初看占地不小，但想到这里曾是三国时魏吴两国十万大军厮杀之地，又感觉水面狭窄，地域也不大。逍遥津，好洒脱的名字。在这洒脱的背后，充满了历史的惊涛骇浪。一入公园大门，迎面看见张辽的塑像。仿佛告诉人们，逍遥津就是张辽的逍遥津。

合肥自古是江淮重镇。历代王朝南北之争，双方都将黄河长江视作自己的门户，只在这中间的公共流域淮河摆开战场。北伐历来不易，成功者罕见。但北国将士一旦饮马长江，南方则离俎上鱼肉不远了。

三国时，魏吴在此纠缠恶斗了六次，“襟喉”“唇齿”之地可见一斑。东吴欲扩张，必先拿下合肥，却屡战屡败，未得淮南寸土。两次是兵败而逃，四次是不克而还。东吴北伐野心，就此止步。这里说说魏吴的第二次合肥之战，此战又称“逍遥津之战”。

公元215年，曹操率大军西征汉中，留下张辽守合肥，守军仅七千余人。名将张辽智勇双全，胆略过人。他预估孙权必定趁虚来犯，事先开凿了藏舟浦，用来隐藏舟船，还在逍遥津上将一座石桥拆毁。他推演整个战事，又神算出敌军的进退路径。

未几，孙权亲领十万大军进攻合肥。张辽在孙权尚未完成合围之前，组建了一支八百人的敢死队，先发制人，直捣孙权大营。突袭迫使东吴大军溃退。稍后，东吴大军又重新集结，围城十日。张辽固守待援。东吴大军终因士气低落，疫病蔓延，无奈撤退。张辽见状，主动追击。

退兵的孙权还要作秀，他气壮山河率千余人为大军断后。谁知，大王的舍身之举反酿成丢人现眼之尴。他仓皇逃到一座小石桥边，桥板早已被能掐会算的张辽事先派兵拆掉。孙权仰天长叹“天灭我也”。正巧一名牙将赶到，叫孙权将马后退几尺，然后在马背上猛击一鞭，坐骑一跃飞过了小石桥。后世留下了“退后著鞭驰骏骑，逍遥津上玉龙飞”的传说。今天公园里，这座小石桥前还立了一碑，上书“飞骑桥”。

是役，孙权险遭擒获。据说他滑脚溜走的原因，居然是张辽不认得孙权。将军不识至尊，导致倥偬之间擦肩错过。一个命好险，一个运好背。事后，曹操封了张辽一个征东将军的头衔。大历史往往由一个小小的细节而改变走向。

这不禁让人想起隋唐的虎牢关之战。李世民率三千精骑突袭窦建德十万大军。擒贼擒王，拿获窦建德，一举定天下。想想张辽，要是八百精骑擒拿孙权，那三国版图早已重新划分了。唐朝的昭文馆大学士徐彦伯将张辽与卫青相提并论，他写下《登长城赋》：“卫青开幕，张辽辟土。”

逍遥津之战使张辽声名远播，东吴民间甚至小孩夜半闻其名而止啼。七年之后的江都之战，曹丕第一次亲征东吴，不忘带上疾病缠身但令东吴将领畏惧的张辽，欲行虎威犹存、余勇可贾之计。最终张辽病逝疆场，死而后已。

今天的逍遥津既遗存了“蘧庄”的雅韵清音，又留下了张辽的铁马金戈。阔水悠悠，萧然意远。

旅游